

SHIJI XUEREN

第四卷

ZISHU

世纪学人

自述

他们

构成了一幅

20世纪

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
全景图

他们的心路历程

集中地

浓缩着

民族的精神历程

学者集体的心路

就是民族的心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第四卷

高增德丁东编

立
纪
学
人
自
述

费
孝
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高增德,丁东编.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02-0558-7

I. 世… II. ①高… ②丁… III. 学者-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312 号

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

SHIJI XUEREN ZISHU

高增德 丁东 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47 000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302-0558-7

I·450 定价:20.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辑入了本世纪中国学术上垂范当代的两百名社科学者的自述。所选学者生于1888—1936年间,以生辰为序,分为六卷。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著述接武先哲,启牖后学,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对于关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演进史及学术发展史的读者,本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卷收有林庚、季羨林、金克木等三十四位学人的自述。

序 言

高增德 丁 东

20 世纪快要结束了。在告别 20 世纪之时，我们把这套六卷本的《世纪学人自述》奉献给读者。

本书是二百位社会人文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全景图。有人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民族的大脑，那么社会人文学者，应该是民族大脑中最具有理性的部分。他们的心路历程，自然集中地浓缩着民族的精神历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学者群体的心路，就是民族的心路。

进入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显学。反思本世纪中国人走过的道路的书籍，也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就知识界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社会关注；就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理性的觉醒。在行将步入新的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具有反思历史的自觉，认真回顾一百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前瞻 21 世纪的进程。

由中国古代的学术与西方的近代学术碰撞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诞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发展至 30 年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学科分类

和相当的研究规模，产生了诸多的学术流派和富有活力的学术传统，出现了一批堪称一流的研究成果。然而，到 50 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人文学科都失去了自身的特点，被改造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有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在“反右”以后干脆被取消。到了“文革”时期，文、史、哲、经，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工具，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喇叭筒，不管是有名无实的学科，还是无名无实的学科，到此已经停止了学术生命。直到 70 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社会人文学科才得以起死回生。各学科的重新建设大约开始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大体上已经全面铺开，过去有过的学科又都恢复了，国际上有而中国没有的学科也建立了，甚至一些中国独有的学科也产生出来。然而，比起学科的恢复，学者的人格和学术自信的恢复，大约还要晚十年。老一代学人经过“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生存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哪还有健康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到了 80 年代初，心态还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下子找不回当年的学术自信 and 风采。中年一代的学者从教条主义的阴影下挣脱出来，想要冲破思想的牢笼，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直到 90 年代，“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才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身体力行。内伤的深重，使中国社会人文学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才重新与曾经有过的学术传统接轨，同时敞开怀抱，呼吸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八面来风，使得社会人文学术重新走向兴盛。收入本书的二百位学者自述，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人文科学曲折的发展轨迹和坎坷的奋斗历程。

本书的启动，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底。当时高增德筹备创办《晋阳学刊》杂志，设计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

栏，向健在的老年学者约组自传，同时也请学生和亲属为先哲立传。当时的着眼点，首先是抢救史料。那些成名于 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学者，一部分没有熬过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已经过早地辞世，健在者也年逾古稀，乃至过了耄耋之年。请他们留下第一手的叙述，成了当务之急。有的学者年老体弱，已经不能执笔，只好口授整理。有的学者刚刚写完自述，就驾鹤西去。这二百位传主，一半以上已然作古。这些自述的成稿年代不一，其中有一部分完成于 80 年代初期，当时有的传主经过多年失语，尚未完全恢复学术自信。如果晚几年写，他们的思想可能更为解放。然而，自然规律又不容许我们等待。所以，他们留下的文字不免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大病初愈的特点。虽然今天的读者可能感到不尽如意，但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价值。一些学者心态逐渐开放，后来撰写的自述，就不只具有史料性，同时具有现实的思想性了。因为是自传和他传同时组稿，有些重要的学者，当时有他人为之作传，所以没有约写自传；因为本书纯属民间行为，有些重要的学者，没有联系上。这些缺欠，只好等本书有进一步扩大规模或增编续集的机会时来弥补。

本书的编排，以传主的年龄为序，而不按传主从事的专业分类，主要不是因为有些传主跨越几个专业，不好分类，更重要的是希望形成一种历史感。那些出生于上个世纪末，亲身感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是第一代；出生于本世纪前一二十年，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是第二代；出生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学术活动的是第三代。虽然每位学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同代人的命运却有颇多相似之处。学术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聪明才

智的发挥，很难不受这种大环境的制约。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感喟。本书的传主，以第二代为多。而一些第一代的学者自述，当时没有抢救得到，不免留下永远的遗憾。

这些自述，对于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有独特的价值。本书的大部分传主，在本学科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自述，反映了那个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学理，讲述了他们的师承、交流和治学经验，这是学术史方面的价值；这些学者还叙述了求学的经历，早期的讲到旧式的私塾和本世纪最早的新式学堂，一些人讲到留学的经历，许多学者还有执教的经历，这是教育史方面的价值；其中一些学者参加本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思想论争，有的还是论争中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回忆，为思想史留下了重要的证言，这是思想史方面的价值；在 20 世纪中国，学人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也曾在全能政治的环境中，失去了独立的社会角色，这些自述，反映了学者阶层的命运变化，这是社会史方面的价值。

最近几年出版的学者传记、年谱或评传日渐其多，但我们还是感到自传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自传、日记、书信都是第一手资料。虽然第一手资料的可靠性也需要辨析，但毕竟是其他研究工作的原始依据。没有原始材料做基础，其他研究就成了空中楼阁。这就是我们格外看中自述价值的理由。书中多数自述附有著述目录，均按原貌刊印，未求格式统一。

这些文稿的出版经历了许多周折。80 年代初，就有一家出版社与高增德合作开展这项学术工程。先是面对僵化思想的禁锢，审稿每每遇到阻力，后来又面对市场压力，严肃纯正的学术书籍印数骤减，再加上当时经验不足，过于相信君子协

定，该出版社易人毁约，使这项学术工程半途而废。多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慧眼识珠，诸位编辑鼎力推动，使得这套《世纪学人自述》得以面世。在此我们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致以深深的谢意。另外，虽经努力，我们至今尚未与一些作者取得联系，恳请这些作者或家属尽快将通讯地址告诉出版社，以便奉寄稿酬。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费孝通先生题写书名，感谢那些提供自述的学者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与宽宥。对于一百多位故世的传主，我们只能追怀他们的成就与业绩，把他们的告白传诸后人，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目 录

【 1 】	萧 乾自述
【 26 】	林 庚自述
【 29 】	王毓铨自述
【 50 】	林耀华自述
【 78 】	傅庚生自述
【 86 】	陈盛清自述
【 91 】	陈彪如自述
【 101 】	谭其骧自述
【 115 】	傅衣凌自述
【 124 】	张舜徽自述
【 130 】	季羨林自述
【 147 】	林焕平自述
【 162 】	张震泽自述
【 177 】	陈 述自述
【 190 】	王利器自述
【 214 】	龚祥瑞自述
【 224 】	周辅成自述
【 242 】	张志岳自述
【 251 】	韩德培自述
【 269 】	杨一之自述
【 280 】	金克木自述

【293】	史念海自述
【305】	关梦觉自述
【316】	吴 泽自述
【339】	顾学颀自述
【352】	罗继祖自述
【373】	张述祖自述
【381】	王钟翰自述
【388】	朱杰勤自述
【398】	姚奠中自述
【418】	王铁崖自述
【427】	李 奇自述
【445】	王仲荦自述
【462】	王玉哲自述
【468】	索 引



萧
乾
自
述

我是在北京东北城一个角落里出生并长大的。40年代当我漂流在外时，每逢想家，我的心就总飞向那个破破烂烂的角落。那个贫民区在我的梦境里永远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我常把羊管胡同——我的出生地，幻想成一张破了边的荷叶，我是一颗干瘪的莲子。我那位寡妇妈却把这颗干瘪的莲子捧在掌心，有时还裹在她的衣襟里。瓦盆胡同：我从那里上的私塾，开始了我漫长而曲折的学历。小菊儿胡同：我就是从那里进的地毯房，也是在那里眼睁睁看到妈妈停止了呼吸，最后一次阖上她那双温顺而慈祥的眼睛。

我是个遗腹子。按说这没什么不光彩，然而小时候，所有的长辈们对这一点都讳莫如深。还是有个姑姑一回气急了，脱口骂了我一声：“你这暮生的孩子！”我转弯抹角问了几个人，才搞清楚“暮生”的含义，知道我是在父亲去世后出生的，甚至在1936年我为《栗子》^①写的那篇跋——《忧郁者的自白》中，对这一点我还是含糊糊糊。我是这么写的：“我先得承认我的爸爸是个稀有的怪

① 《栗子》，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55页。

人。我不曾有运气见过他。在我刚见天日的时候，他便咽了气。他是闷郁而死的。”直到那时我还在隐瞒自己是个遗腹子。

我是蒙族人，是少数民族。这个事实我也一直隐瞒到1956年审干写自传时才坦白出来，说明它也是造成我自卑的一个因素。

解放后，少数民族大大翻身了。四十岁以下的读者恐怕难以理解是蒙族而不是汉族有什么可自卑的。他们不晓得那时有些少数民族的名称还加“犸”字旁呢。呼和浩特的旧称是“绥远”和“归化”。那时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只有汉族是红色的。在学校里，我经常看到汉族同学追着回族的孩子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甚至带点口音的南方同学都被叫做“豆腐皮儿”或“蛮子”。

在这种气氛中，我只有把自己的蒙族身份隐瞒起来。每逢填籍贯，我就胡编。我填过“大兴”，填过“通州”，后来一个朋友为了使我能考大学，还替我造了一张“原籍广东潮阳”的假文凭。

解放以后，少数民族不但不再受歧视，而且往往还受到特殊照顾。正因为如此，我不想改填“蒙族”。直到今天，我一方面在自传里坦白了，但填表我还常填“汉族”。这主要是由于除了“祖籍”，我身上并没有任何蒙族的意识和特征。我们进关已经好几代了。我父亲死得那么早，我母亲又是汉族——她姓吴。我一句蒙古话也不会说。1956年访问内蒙时，锡林格勒盟的盟长问我们要吃汉式还是吃蒙式早点，我们全说吃蒙式的。事后，我有半年连奶味都怕闻。这些情况使我觉得填“汉族”还更诚实些，填“蒙族”倒近似冒充。

关于蒙族，我惟一的记忆是小时候年下祭祖。堂兄家供着

一座祖先的牌位——在一块木板上画了肖像，那完全是个牧民的样子，平常用黄布遮起。还有一本家谱之类的书，里面写的统统是蒙文。祭祀时，上供用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

总之，这个民族问题也是使我形成自卑感的一个因素。

给我幼小心灵打上更深的自卑烙印的，还是贫穷以及生命最初十四年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那嫌贫爱富的社会里，穷就矮人一头，有时还不止一头。跑当铺，叫“打小鼓的”，打粥，甚至断炊，都还只意味着物质上的匮乏或生理上的痛苦。我母亲为人佣工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精神上的凌辱。她干活的地方离家并不远，但是一个月才准回来一趟。所以我虽然有母亲，却好像没见几面她就离开人世了。有时由于太想她了，有时是为了缺钱，下学之后就到她那个“宅门”外边去守候。碰上好心人，兴许给我往里头捎个话儿，她抓机会溜出来，鬼鬼祟祟地搂我一下，塞给我几吊钱，就又消失在朱门里了。大多数情况下，不但见不到，还要遭白眼、受叱骂。

我的童年过得就是这么孤寂，这么狼狈。没有玩具，没有画书，人间的温暖不多，而且很快就熄灭了。

然而我从未对人间失掉过信心。我遇到的好人比坏人多得多。耻笑我穷的是少数，更多的是帮我一把的。我上的崇实中学（现在改称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宿舍叫做“北楼”，共五层。冬天，暖气只能上到二三层，四五层冷得赛冰窖。当时我只有从妈妈那里世袭过来的一条薄棉被，里面的棉絮早已滚成团团，大面积都成“夹”的了。由于拿不出什么来孝敬马斋务长，工读生的我，照例被分在五层楼。“暖”气管凉得不敢去摸，连鼻涕眼泪都冻成了冰。晚上熄灯之前，总有不是一位同学抱来棉袄或是大衣，为我压在被子上。1928年冬天带我去

潮州的那位赵姓同学，和我并不熟。他是个华侨，我只曾陪他去过一次北海，还把他照相机的三角架给丢了。然而当他听说我被崇实开除了，并且上了国民党市党部的黑名单时，就毫不犹豫地提出带我去广东。1957年以来，在患难中，姜钟德、李蕤、朱海观、丁化贤等同志冒着政治风险向我表示了深挚的友情。他们的好心我是永远难忘的。

我是在朋友堆里滚大的，因而格外珍惜友情。我能活到今天，有我个人的奋斗，也由于总不断得到友人的关注、指点和鼓舞。

二

去年出国，才发现关于我的生辰，海外流传着不同的说法。这应由我个人负责。我的生辰原无足轻重，但既然发生了歧异，我就有责任澄清一下，尤其由于这种混乱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小的时候既没有什么“出生证”，也从没人向我交代过我的出生年月。有一回来了个会算卦的亲戚，他要我的八字。这下子我才知道我是宣统元年(己酉)腊月十七生的。另有一回，就是那个骂我是“暮生”的姑姑，嫌我淘气，又骂我是“午时鸡”，我才知道自己属鸡，是午时生的。但是合成阳历我的生辰应当是哪年哪月哪日，我并不晓得，也从来没感到有晓得的必要。

1939年去英国之前，香港《大公报》替我申请护照时，拿来个表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那么认真地填表格。战争年月，哪里去找阴阳历对照表！当时宣统正在“满洲国”的宝座上，我不愿当他的子民。倘若当康熙、乾隆那样盛世帝王的子民，

倒还不在于；给末代皇帝当子民，我不甘心。何况他又在长春给侵略者充当傀儡！所以就把年头写成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日子就权将阴历改成阳历。于是，我的生辰就成为1911年12月17日。

这么一改，就得改下去了。七年在外国，领配给证也好，住客栈也好，只能照护照来填。1949年到北京向派出所报户口，为了简便，省口舌，就又照填了。1958年普选之前，倒是有位户警同志夹了个本子到院子里来，喊了声：“谁对出生年月不清楚，可以到派出所来核对。”那确实是个大好机会，可那时报上已经对我展开批判，我已被定为“右派”了，连有没有选举权也还不清楚，心想，反正这辈子完了，还管它出生年月干吗！就没去核对。

十年浩劫期间，实在没的可交代了，有一回我打了个报告，说自己是宣统元年生人，这样就糊里糊涂地把年份自动改为1909年。最近，也就是1979年10月，在耶鲁大学张充和家里小住的时候，同她的汉学家丈夫傅汉斯教授说起这个问题。他立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阴阳历对照表一查，这才确定我的生辰应当是1910年1月27日。也就是说，活到七十岁，我才把自己的生辰闹清楚。

三

我不但不是什么书香人家出身的，而且由于工读，我受的教育十分畸形，真正是学无根底，又加上自己一向贪玩，始终也没能把缺欠的部分弥补上。

我上学并不晚，六岁就进了设在新太仓一座庙里的私塾。1973年一个傍晚，我曾去重访那个地方。庙宇早已拆掉了，

如今盖了个纸匣厂。20年代初期，每逢初一、十五，庙里总挤满了烧香的信男信女。私塾在大殿右侧一个黑黝黝的角落里。五十来个学生挤在一座座砖砌的小台子周围。墙壁中央上端挂了一张残旧不堪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上课前下课后我们都得朝它作上三揖。每个学生面前都摊着一本“四书”，好像解闷似的，从早到晚我们就扯了喉咙“唱”着经文。那时还用铜制钱。早晨上学的时候，总带上两个制钱买烧饼或者马蹄，照例腋下夹着书包，夏天还拎着一壶开水。

这个私塾上了不到半年，我就待不下去了。因为不但逢年过节我不能像旁的孩子那样给老师提个蒲包，连每月的束脩我也交不上了。于是，老师动不动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板子也越打越重。说是“《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可我才念了半本《论语》，身上就给打成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那大约是五四运动前夕，新学就像一股清风，吹进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时我妈妈已经出去佣工了。她决定把我送进九道湾一家私立的“新式”学堂。这是一个路西高台阶的宅子——现在已成了个大杂院。妈妈替我买了新式的教科书。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还有图画。上学那天，她让我穿上特意为我新缝制的蓝布大褂，亲自把我送去。那个胡同弯来弯去，好像不止九道。每拐一个弯，她就拽拽我的大褂，生怕身上有个褶子，一路反复叮嘱我：“咱们这房就你一个，可得给妈争口气！”

这个学堂的课室设在东西厢房，老师一家住在北屋。我们进去后，妈妈就打开手绢包儿，拿出她用汗水低三下四为我挣来的学费，毕恭毕敬地放在八仙桌的一角。然后就陪着笑脸托付开了：“我跟前就这么一个，您老多多栽培吧。”

我小心坎里只想知道这个“新式”学堂到底怎么个新法。